

※ 研究動態 ※

經學知識學術制度化及普及化的發展： 以香港學海書樓為例

區志堅^{*}

一、前言

教育成為社會及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此與政治及經濟的演變有相互影響。香港背向中國大陸，面向西方，香江處於南疆，歷史、社會及文化都與中國氣運相關；又因開埠後，受英國治理，香港也受西方的制度、文化及思想的影響，成為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及西方文化的要地。我們不能否認，香港一地的文化，較多是傳自中國。香港歷史文化與中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為血脈相連，隨學者自北方南下，帶來中國傳統經學知識南移香江。然而，中國傳統知識在香港這塊於一九九七年以前為英國殖民地的流播情況是怎樣¹？更重要的是，自五十年代以後，香港受到西方「現代化」觀念的影響下，民間素重視西學及標榜香港為「現代化」之地，如此在

筆者十分感謝黃麗松校長、賴恬昌教授、杜祖貽教授、趙令揚教授、利榮森爵士、何耀光先生於2001年至2004年間接受訪問；又感謝梁元生教授、張壽安教授、周佳榮教授、李金強教授、前金文泰中學李瑞華校長、梁啟業先生提供寶貴資料及意見；更感謝鄭培凱教授批准運用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歷史文化學系前身）於2001年至2004年執行“*In Quest of China: Teach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Hong Kong Universities, 1926 to the Present*”研究計畫內資料，此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進行「北學南傳：學海書樓與香江國學」研究計畫（編號：6905170）階段研究成果。最後感謝評審人提供寶貴建議。

* 區志堅，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¹ 羅永生：〈1960-70年代香港的回歸論述〉，《思想》，2011年第19期，頁117-140；參區志堅：〈西化下的「近現代」(Modern)史觀：以香港出版史學著作、中國史及世界史課程、中學世界史試題及中學教科書歷史書寫為例〉，2015年9月11-13日韓國首爾大學、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韓國歷史教育研究會主辦「近代史研究現狀與教育國際學術會議」宣讀論文，頁49。

香港傳播中國傳統經學知識，其情形又是怎樣？昔日尚未有太多學者注意香港經學知識的流布，至千禧年後，較多學者漸從學術史及教育制度建立互動關係的角度，研究香港一地的經學教育發展²。二〇一五年更有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亞研究所主辦「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內外學者在研討會上紛紛就香港經學的特色、發展及教導經學知識的重要人物，做深入討論。研究經學的專家學者林慶彰教授在大會上，一再呼喚學界應多研究香港經學在國際漢學上扮演的角色³。

中國經學教育在香港的發展，早於宋代末年，新界屏山鄧氏一族早已在香港興學立教，教課四書五經，推動鄉土儒學教育，自此新界農村教育日漸興盛⁴。一八四二年開埠後，港英政府及民間團體也積極推動經學基礎知識教育，如晚清學者陳子褒、盧湘父均為康有為的弟子，紛紛在港創辦學校，主持講座，教導有關經學等國學知識；子褒開辦子褒書院，湘父開辦孔子學院和湘父書院，在香港及澳門廣收學生，宏揚孔學。他們教導四書五經的知識，由是促成經學知識進一步隨南來學人南

² 近人多注意香港的課程設計與香港經學知識流布的關係，見車行健：〈現代中國大學中的經學課程〉、〈胡適與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的變革〉，《現代學術視域中的民國經學——以課程、學風與機制為主要觀照點》（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1年），頁1-34、41-58；趙令揚：〈儒學與香港專上教育關係之今昔〉，杜維明主編：《儒學發展的宏觀透視》（臺北：正中書局，1997年），頁223-225；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2007年）；羅香林：〈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年），頁223-229；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中文哲學課本》的啟示〉、〈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一年間的發展〉，林慶彰、蔣秋華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第5冊，頁521-553、555-596；區志堅：〈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孕（1920-1927）〉，《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學報》，2007年第4期，頁29-59；區志堅：〈怎樣教導婦孺知識？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啟蒙教材〉，澳門理工學院編輯委員會編：《「辛亥革命與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澳門：澳門理工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07-426。

³ 林慶彰：〈香港經學文獻的檢索與利用〉，2015年5月6-7日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亞研究所主辦「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⁴ W. Lobscheid, *A Few Notices on the Ext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Schools of Hong Kong: With Remarks on the History and Religious No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Island* (Hong Kong: China Mail Office, 1860), pp. 17-29; 方駿：〈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0）：早期香港中文師資的重要搖籃〉，《教育研究學報》，2005年第1期，頁130-133；羅慧燕：《藍天樹下：新界鄉村學校》（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頁53-78。

下香江⁵。乃至民國建元，國民政府頒布「禁讀五經」的小學政策後，中國內地特別是廣東地區及香港的私塾、村塾、蒙館及書塾，更有出版「粵譯」《論語》讀本，雖未能使中國傳統學術成為一套有系統的學問，也已能在香江保存經學知識，及把經學知識傳於民間⁶。

然而，學問能夠連續不斷地流傳下去，世代相承，必然有賴一所健全及穩定的學術機構，按學生程度進行教導，使知識藉一套有系統的培訓制度傳播下去。然而自北方南下的經學教育，要成為一套有系統的學問，必有賴學術制度化的過程，由是確立香港經學文化教育步向學術專業化的發展方向⁷。

而高等院校從事中國文化知識教育，其內容有：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及經學等各方面的學科。在香港高等院校的情況而言，以上學科最早是孕育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以下簡稱港大）中文學院（按：港大中文系於1927年成立時，並沒有Department的英文名稱，與文學院轄下的其他學系不同，英文文字只稱為Chinese Section。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改稱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之後才改稱為Department of Chinese。中文學院的正確英文名稱應是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是二、三十年代港大三個學院之一的文學院“Faculty of Arts”屬下的一個單位）⁸，此代表了香港中國文化教育及經學知識，趨向系統培訓及學術制度化的發展方向。二、三十年代的港大中文學院，在晚清翰林及遺老任職教員之下，他們多教導經學知識，也使經學知識得以在香港大學進行系統培訓及傳播。故探討香港高等院校經學知識及中國文化教育學術制度化的發展問題，必要先探討港大中文學院。然而中文學院的籌辦，與一群由南來遺老籌辦的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的理念是一脈相承的，所以要了

⁵ 區志堅：〈怎樣教導婦孺知識？盧湘父編撰的早期澳門啟蒙教材〉，頁407-426。

⁶ 盧鳴東：〈粵、港地區《論語》粵譯讀本兩種——民國時期私學授經的情況〉，李雄溪、林慶彰主編：《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年），頁785-808。

⁷ 研究學術專業化發展的成果，見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一書；參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一書。

⁸ 有關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發展，參見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李景康與《儒家學說提要》的啟示〉、〈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中文哲學課本》的啟示〉、〈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一年間的發展〉，林慶彰、蔣秋華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第5冊，頁495-518、521-552、555-596。

解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原因，也須先注意遺老籌辦中文學院的理念及貢獻，而這群晚清遺老，也多是其時香港學海書樓的主席、主講、講員及董事會成員。港大中文學院未成立之前，這些南下香江的教員多聚集在學海書樓，聚書樓論學及唱籌，書樓可視為南下前清翰林的「集散地」。故談及香港經學知識的教育及發展，不可不注意位於香港的學海書樓。

同時，在二十世紀初，傳往香江的中國傳統（經學）學問，不獨是朝向有系統的發展，更朝向知識普及化的發展。促使二十世紀中國學問南下，使香江不再是一個文化的沙漠，這股力量與一群失意於北方政權，卻又忠於清室的晚清遺老，及他們自行組織的學術機構的發展甚有關係。上文而言，在新式教育制度下，香港第一所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及經學知識的學系，是一九二七年成立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第一屆中文學院全職教授，就是賴際熙（1865-1937），其後有溫肅及區大典等先後執教其中。至於學海書樓的董事之一也是賴氏，而中文學院的成立，既標誌了香港中國文化教育及經學知識，踏上學術系統化的新開始，學海書樓則是代表了中國傳統學問流播香江及經學知識普及化的發展方向。而連繫二者的人物，就是南下香江的晚清遺老賴際熙及其執教書樓的前清翰林。這群遺老不獨執教中文學院，更編寫講義教材，使學生接受一套有系統的經學及史學知識，促進了中國文化教育在香港走向專業化、普及化的發展。雖然近人已研究早期中文教育史，並注意學海書樓及賴際熙，但尚未注意學海書樓及以書樓為中心的學者群體，在書樓成立至今於香港經學知識教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地位⁹。

⁹ 相關研究成果，如方駿：〈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堂（1920-1940）：早期香港中文師資的重要搖籃〉，頁 130-133；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 年），頁 258-322；吳倫霓霞、鄭赤琰：〈香港華文教育發展與中國的關係〉，鄭赤琰、吳倫霓霞編：《兩次大戰期間在亞洲之海外華人》（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9 年），頁 169-183；程美寶：〈庚子賠款與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二三十年代香港與中英關係的一個側面〉，《中山大學學報》，1998 年第 6 期，頁 60-73；Bernard Hung-Kay Luk, “Chinese Culture in the Hong Kong Curriculum: Heritage and Colonialism,”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5.4 (Nov. 1991): 650-668. 也有一些港大教員編寫文章，描述中文學院的發展情況，如 Frederick Drake, “Chinese and Oriental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e First 50 Years 1911-1961*, ed. Brian Harris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43-147；羅香林：〈香港大學中文系之發展〉，頁 223-229。對學海書樓的研究，見曾漢棠：〈香港學海書樓與粵港文化的承傳關係〉，學海書樓七十五週年紀念特刊編輯小組：《學海書樓七十五週年紀念特刊》（香港：學海書樓，1998 年），頁 13-26；〈保全國粹、宏揚文化：香港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學海書樓編：《學海書樓八十週年紀念集》（香港：學海書樓，

學海書樓於一九二三年成立，地點在港島般含道二十號樓上。書樓「仿廣州學海堂」聚書講學的辦學宗旨，為香港第一間私人創辦公共圖書館，讀者可以隨時借閱書樓所藏經籍。書樓自創辦後雖經戰亂，及後樓址重建，並樓址屢易，至二〇〇〇年，書樓更購置永久樓址，繼續與香港大會堂、各社區公共圖書館，以及香港各大學校外進修課程部等學術機構，開辦國學及經學課程，免費派發講義，以便群眾吸收及學習經學知識¹⁰。二〇一五年，舉辦學海書樓走向九十二周年的慶典，書樓成為香港傳播和普及經學知識最長久的機構，故談及香港經學知識普及化，也不可不注意學海書樓。本文主要探討學海書樓的翰林主講，藉舉辦學術講座及私人籌辦公共圖書館與民間普及經學知識的關係。本文更運用有關檔案資料及口述訪問賴際熙先生後人賴恬昌教授等，並得其惠贈有關文獻，得見賴氏及學海書樓的發展。本文尤指出，這群遺老居香江，與一群華商的交往，不是為了金錢，或為找一個安定的地方，或終日可以吟風弄月，而是有其辦學的志趣；他們與華商及港督的交往，乃是一種實踐志趣及抱負的表現¹¹。

二、學海書樓主講與書樓早期發展

辛亥革命至北伐統一中國之前，中國內陸因尚未出現一個統一的政府，一九一三年，陳炯明宣布廣東獨立，通電討袁，廣東也加入「二次革命」。卻因廣東都

2003年），頁13-25；鄧又同：〈本書樓七十年概況〉，《學海書樓七十週年紀念集》（香港：學海書樓，1993年），頁9-20；李健明：〈學海書樓與順德文人〉，《話說順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118-120。簡單略述任教書樓的學者，如何藻翔、陳伯陶及賴際熙，見張解民：〈清末直臣何藻翔〉，《順德歷史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90-93；陳紹南：〈陳伯陶生平〉，《代代相傳——陳伯陶紀念集》（香港：編者刊行，1997年），頁10-11。一般研究二十世紀粵海文化互動的成果，已略述學海書樓的辦學情況，見許錫輝：《粵港澳文化關係》（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18；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年），頁271-276；趙雨樂：〈二十世紀上半葉粵港文人的雅集與交遊〉，劉義章、黃文江合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年），頁57-74；程中山：〈導言〉，陳國球主編：《香港文學大系（舊文學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59-61。

¹⁰ 陳紹南：〈鐸傳九十載 源流三百年〉，《學海書樓九十年》（香港：學海書樓，2013年），頁5-6。

¹¹ 曾有表述居港的清遺老是「腰纏萬貫的富翁」、「多染阿芙蓉癖」，見陳謙：《香港舊事見聞錄》（香港：中原出版社，1987年），頁348。

督陳炯明、被袁氏任為廣東宣撫使的龍濟光互相攻擊，龍濟光更率軍入廣州，任廣東省都督，二次革命失敗，捕殺革命黨成員。袁氏稱帝後，龍濟光封為郡王，廣徵清遺臣，更有報導其時「遇有人民訴訟，任令需索，其黑間較前十倍」、「默察地方吏治，見州縣之官，十之九焉，為前清聲名浪藉之污吏，……吏治之壞，達於極點」，經濟上廣徵賦稅，濫發紙幣。一九一五年冬，全國爆發反袁浪潮，蔡鍔領導護國戰爭，陳炯明再次組「共和軍」，興兵反袁討龍，龍濟光敗走瓊崖。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間，廣東一直為以陸榮廷、陳炯明、譚浩明、沈鴻英的桂系為首的西南軍閥所控制。一九一七年中，孫中山為維護臨時約法，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並進行護法之役，終因陸榮廷的反對，致護法失敗。粵軍回粵，攻下惠州，在陸榮廷治下的廣東「殘害吾民，無所不至」、「年中因喪命傾家賣妻鬻子者，以數萬計」、「粵人損失，年逾千萬」此敘述雖有誇張，但也可見民間反對革命後的廣東政治動亂及民生困苦的情況。一九二二年，廣東又有陳炯明炮轟總統府，滇、桂、粵軍聲討陳炯明的事件。一九二四年廣州沙面發生大罷工，其後演變成為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年間省港大罷工，孫中山也於一九二三至二四年重組廣州國民政府，及籌辦黃埔軍校。一九二六年至二七年北伐成功，革命軍勢力已至黃河流域。而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在李濟深率領南征軍，平定了瓊州、雷州等地，廣東的粵東、粵西漸成為國民政府控制。終隨北伐的完成，廣東省宣告統一。

早於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廣東已有劉師復倡言無政府思想，成立晦鳴學社，其後隨龍濟光禁止無政府主義團體的活動及師復於一九一五年死後，廣東的無政府活動暫時削弱。從五四運動前後至一九二四年，廣東出現了無政府主義的團體有十個。一九二一年，無政府主義者發起組織工人慶祝五一勞動節遊行。一九一九年，廣東早期的共產黨員彭湃已在譚平山創辦的《廣東群報》上發表白話文。一九二〇年陳獨秀到廣東，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積極宣傳白話文，發表批判孔孟的文章，更批評：「粵人最崇拜孔子，遇聖誕日，全省若狂，其興高采烈，甚於國慶。……舊日的道德：甚麼三從四德、貞操、三綱五常，……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敬鬼神，……估定他的價值，實在不值半枚銅錢」，廣東也興起新文化活動¹²。

¹² 有關民國時期的政治及文化發展，見丁身尊：《廣東民國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上冊。要注意的是，廣東各地對武昌起義的反響，是不一致的，既有主張革命排滿，也有反對革命的言論，見黃宇和：《中山先生與英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年），頁497-501。

革命後，香港雖經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市民慶祝革命發生的騷動、一九一二至一三年的電車工人罷工、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九二二年的海員大罷工，乃至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省港大罷工發生之前，雖有「趕走英人」的行動，香港在英國治理下，經濟發展受到影響，也有共產黨成員在香港活動，但相對國內政治及經濟發展，較為安定。很多資金也因國內政局不安，遂多運往香港。外國商旅也因香港為英國殖民地，香港匯豐銀行及航運業的發展，使香港成為中國沿岸貿易的中心，也與東南亞及英語世界保持商務聯繫的通道，促成建立「倫敦—廣東—香港」的三角關係；又因港英政府對華人採取較寬容的態度，香港成為北方及廣東華僑、難民、移民的中轉站或居留地方¹³。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也呈現一種崇尚傳統儒家文化的氣氛。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以後，北方出現新文化運動，學術界提倡以新方法研究國學。隨著政治環境與學術風氣的改變，一些清遺民相繼南下，往香江及南洋一帶。香港、澳門成為南下遺民聚集的地方，他們多執教在香港中小學及私塾。正值革命後，港英政府加強管理各學校，鼓勵香港士子讀經，並選用了金文泰老師、宋學鵬編的《香港國家簡明漢文讀本》為教科書，內容以傳播儒家文化道德。其時視學官員余藝便說：「若想維護舊道德，使學生知書識字，必須讀經尊孔。」皇仁書院漢文總教習陳達明更向英人校長建議，漢文課本以講授經書為主，故「一時讀經復古空氣相當

¹³ 二十世紀初，前往中國的英籍旅客也認為，香港政治及經濟情況較中國內地為佳。雖然這是因為他們身為殖民地主義者的觀點而影響其評價，即：英人占領後，改變了香港走向「現代」的地位。但這也可以作為一種西方人士對香港觀點的參考。見 Elaine Yee Lin Ho, "China Upriver: Three Colonial Journey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anton, 1905-11," in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ed. Douglas Kerr and Julia Kueh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19-32；有關二十世紀初，香港政治及經濟發展情況，參 Steve Tsang, *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0-91；Ming K. Chan, "Hong Kong in Sino-British Conflict: Mass Mobilization and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in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ed. Ming K. Cha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7-58；莫凱：〈現代貿易體系的成長歷程〉，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香港：三聯書店，1997年），頁281-93；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07-146；廣東的共黨分子雖於二十年代初已在香港展開活動，但比較香港與廣東，明顯地可見，於1923年罷工活動展開之前，香江較少有共黨分子煽動政治活動，見 Chan Lau Kit-ching,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nd Hong Kong, 1921-193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36。

濃厚」¹⁴，陳漢章也於此時在香港成立孔教分會及孔教學院。孔教會主席劉鑄伯於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指斥學生參與五四運動，並推動孔孟之道。另一位中華總商會委員李葆葵與雷蔭蓀更籌辦孔聖堂、孔教學院，又舉辦「每星期敘會，於灣仔之官立書院宣講四書互相討論，並辦文明報及派員在輪船宣講」¹⁵，且在文武廟西營盤巡迴演講，藉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全盛時期的孔教會，在香港設立三十多所講習地方，香港在二、三十年代學術界多受傳統文化氛圍的影響¹⁶。

革命後，很多前清翰林初時面對以上中國國內政局混亂、國民政府政權不穩定，多希望復辟，故曾做出支持張勳及日本政府扶植清帝的復辟活動。及後，隨多次復辟的失敗¹⁷，北方在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尚新文化的氣氛下，在學術上既尚經學及孔子的教學理念，又曾支持立憲，不容於其時北大的學術及政治環境。他們的選擇：一為再隨東北的清朝溥儀的政權，既有遷居東北及青島，二為留居上海及天津租界，三為居廣東、澳門及香港一帶。居廣東一帶的遺民既拒廣東國民政府的徵聘，部分便擇居香港。革命後，居港的遺民面對革命後北方及廣東的混亂情況，新文化及共產思想的衝擊¹⁸，託庇一個昔日視為「蠻煙蛋雨」文化不甚高、夷狄政府治理下的香江，其所思所想甚值得研究¹⁹；雖以不能否定居港遺民有「離散」心情，而持此心情卻無礙他們對香港文化教育的貢獻²⁰。

一九二〇年清遺民賴際熙等人南下，因感「邪說愈張，正學愈晦」，便在香港中環半山堅道二十七號樓下，聘請名儒何藻翔（字翹高，1865-1930）開始講學，每周二次，主要以闡明孔道及經籍，至一九二三年。賴氏本著「宏振斯文，宜聚

¹⁴ 陳謙：〈五四運動在香港的回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廣東文史資料·第24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79年），頁44。

¹⁵ 區志堅：〈闡揚聖道，息邪距詖：香港尊孔活動初探〉，湯恩佳主編：《儒教、儒學、儒商對人類的貢獻——第二屆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孔教學院，2006年），頁537-548。

¹⁶ 同前註，頁537-554。

¹⁷ 胡平生：《民國初期的復辟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5年），頁14、16。

¹⁸ 有關二、三十年代香港出現共產黨員的言論及其活動，見 *From Nothing to Nothing* 一書。

¹⁹ 有關清末民初廣東及香港政治及文化的時代背景，見區志堅、陳明錄：〈中國現代化的廣東因素〉，沈清松主編：《中華現代性的探索》（臺北：政治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86-92。

²⁰ 有關研究二、三十年代居港遺民的「離散」心情及其以此觀點書寫景物，見高嘉謙：《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6年），頁301-348。

書講學」之志，欲達到「存古」、「衛道」、「順人心」、「拯世道」的宏願，得富商何東、利希慎、郭春秧、梁寶三、李海東等人資助，「仿廣州學海堂之例，創立學海書樓」，求「徵存載籍」，聘請名儒「相與討論講習於其間」，希望能夠把「官禮」存於「域外」，把「鄒魯」存於「海濱」²¹。若再深入探究書樓的特色，須先探究書樓的前身崇聖書堂（初名為崇聖書堂，後改名為崇聖書院）建立的目的。因賴太史在未籌辦書樓前，初欲草擬崇聖書堂（院），書樓的成立乃是實踐崇聖書堂（院）的籌辦理念，故書樓既上承廣東清儒阮元辦學海堂的心意，也有實踐籌辦書堂的宏願²²。因書樓上承崇聖書院的辦學宗旨，由是先看崇聖書堂（院）創立的目的：

一書堂建設以尊崇孔聖羽翼經訓為主，故竝名崇聖藉標宗旨。

一書中國書籍浩為淵海四部，燦深陳百家主雜出，無論專門之學，叢考之編，凡足以羽翼聖訓，即所以維持世教，力所能致，皆當遍采，蓋讀書雖貴專精而藏書則務求完備，殆以中外古今通例也，更仿廣雅藏書之例，其正經正史，通常必習之書，而又非寒士力所致者，每種必多備數本以免閱者向隅。

一藏書必有閱書者，閱書必有講習、討論者，乃能振發精神，維持久遠。今擬書堂建成之後，必延聘通儒為學長，常駐堂以便閱書隨時問難，以時訓課，按次指授；更聘名宿分期講學，以收實益。其常川駐堂之學長，應聘能操正音粵語者，以便各國各省學，皆可通達答問。

一閱書諸生擬仿學海堂例，分專課及隨時講課二途。其專課生，則月考一課，以規識力。其隨時講課生，則年考四課（分四季）。其專課生，又仿廣雅書院例，各備一簿，每日閱書或有疑難，或有議論，隨筆記，匯交學長，依次批答。²³

書堂成立的要旨是「尊崇孔聖，羽翼經訓」，標舉孔子的思想，宣揚儒家學說，維護及宏揚教化，並效法廣東的廣雅書院設立藏書樓的特色，以便公眾借閱書籍。

²¹ 有關學海書樓的發展，見〈保全國粹、宏揚文化：香港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頁 13-26。

²² 承賴恬昌教授借出有關賴際熙創辦崇聖書院的原稿，也承蒙賴教授所示，書樓上承崇聖書堂（院）的辦學目的。

²³ 賴際熙：〈崇聖書堂源起〉（按：因此文沒有題目，故題目為筆者自擬），此文為未發表的文稿。此文與《荔垞文存》內〈籌建崇聖書堂序〉的內容略有不同。

此堂設在香港大學堂附近，上層為藏書，下層講習，以便大學師生及其他公眾人士隨時觀書；又聘請「通儒」學長駐堂，設名宿分期講課，以便學員問學；且仿廣東的學海堂例，分專課及隨時講課，專課學生為月考一課；並為學生例備一簿，寫下每日閱書，或難題，或議論，及筆錄記彙，依次為學長批答。及後，改名為學海書樓，並租香港中環半山堅道二十七號樓下為校舍，做講課。書樓列明講學體制，「月有文課，周有講學」。至今沒有資料顯示二、三十年代書樓的董事的名單，若依一九三六年〈癸卯(1903)，甲辰(1904)科同人敘於香港學海書樓〉的照片所見，共有十人合照，而照片中有六人曾參與書樓演講，依此推論書樓的主要人物為：陳煜華、左霽、朱汝珍、區大典、周廷幹、賴際熙、區大原、陳念典、岑光樾、溫肅。而陳伯陶(1855-1930)、朱汝珍(1869-1943)、溫肅(1879-1939)、區大典(光緒29年進士)、區大原(1877-?)、岑光樾(1876-1960)等均是書樓主講²⁴。同時，我們可見其時書樓既是一個講學的地方，也是一個圖書借閱的機構，務求「保存國粹，聚書講學，兼而有之」。

書樓成立後，除了聘請陳伯陶、岑光樾、區大原、區大典、溫肅、朱汝珍等前清遺老擔任主講，也有名儒俞安鼎、何藻翔諸人講學其中。講學者除了俞、何二人外，餘皆前清翰林，講授內容主要是道德文章，褒揚中國傳統文化，闡述經義，大道忠孝節義，「尤諄諄以辨華夷，明體用詔諸生」，「以宋儒義理及《通鑑》、《通考》掌故之學，啟迪後進」²⁵。他們以遺民自況，感傷身世，有感「相從盡蠻夷」的時勢，以詩自樂，陳伯陶便說：「生不逢辰聊避世，死應聞道且窮經。」俞信芳也說：「香江疑是管遼東，邂逅偏逢異地翁。故國河山空隕涕，異方身世感飄蓬。」何翹高說：「遺老不餓死，貳臣還破家。聲名甑瓦裂，富貴空曇花。」²⁶也可見他們

²⁴ 〈癸卯(1903)，甲辰(1904)科同人敘於香港學海書樓〉，鄧又同編：《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年）。

²⁵ 參鄧又同編《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一書；俞安鼎：《自怡悅齋詩·俞叔文先生傳》，收入余祖明編：《三十六溪花萼集》（1973年刊本），頁1；何藻翔：〈中華民國九年庚申(1920)先生五十六歲〉、〈中華民國十九年庚午(1930)先生六十歲〉條，吳天任編：《何翹高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51、168。

²⁶ 陳伯陶：〈避地香港作〉，《瓜廬詩牘》（自刊稿），卷下，第2冊，頁25下；余信芳：〈過香江朱聘三、毅夫、趙嶧山、張筱峰、雷蔭蓀諸老招讌杏花樓〉，載李巽仿輯：《松桂堂集》（自刊稿），頁93；何翹高：〈宣統庚申七月蒙恩賜福壽字〉、〈述懷祝豫荃同年七十〉，《鄒崖先生詩集》（香港：意蘭畫舍，1985年），卷4，頁14；卷5，頁7。

對前朝的懷思。這時講學的內容，依《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所見，主要有：

陳伯陶：講述經義，有關世道民心，多所啟導。

區大典：講經學，談《易經》，多揚儒學，青年學子，獲益良多。

溫肅：講學多闡發人倫大道忠孝儀節。

朱汝珍：課經史外，宣揚孔學不遺餘力。

岑光樾：主講經史，宏揚儒學。

區大原：課經史，授詞章，嘉惠後學。

賴際熙：課經史，或授詞章。²⁷

以上學者均是廣東籍人士，如：陳伯陶，東莞人，字子礪，又因居九龍，自號九龍真逸。光緒十八年壬辰科殿試，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編修，歷任國史館協修總纂，乙巳入值南書房；一九〇六年，派赴日本考察學務，曾任江寧提學使、江寧布政使，因母病辭官。一九一一年走避香江，移居九龍城，所居為瓜廬，著《東莞遺民錄》、《明東莞五忠傳》及編《宋臺秋唱》。區大典，南海人，字慎輝，號微五，一八七七年生。光緒丁酉科舉孝廉，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科會試，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一九一一年移居香港。區氏曾在皇仁書院等官校教導中文，後來受聘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教導經史，其後再聘任為尊經學校校長，著有《經學講義》等²⁸。區大原，南海西樵人，字裕輝，號季海。光緒二十九年會試，賜進士出身，授檢討，曾任廣東法政學堂監督；一九一一年後移居香港，受聘官校課經史。賴際熙，增城人，字煥文，號荔垞，生於同治四年。光緒十五年舉孝廉，二十九年癸卯科會試，賜進士出身，派進士館習法政，畢業後授編修、國史館纂修及總纂。一九一一年後移居香江，於一九一五年請香港政府劃地數畝永作宋皇臺遺址，一九二三年於香港島般含道創立學海書樓，授詞章及經史，並請居港前清翰林登書樓講學。及後，賴氏受聘港大中文學院任院長（系主任），又為港大籌設中文藏書。溫肅，字毅夫，順德人，號槩庵，生於一八七八年。光緒壬寅順天鄉試舉人，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會試，授編修，旋任湖北道監察御史。在任一年，屢劾親貴，疏數十上。一九一一年後，勤勞王事，丁巳復辟，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後於書樓及香港大學中文學院講

²⁷ 參鄧又同編《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一書。

²⁸ 有關區大典生平及經、史學成就，見許振興：〈《史略》與區大典的史學視野〉，林慶彰、蔣秋華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第4冊，頁365-389。

學，多次返上海及天津等地參與支持溥儀復位的活動，於一九三九年逝世。著作有《貞觀政要講義》、《龍山鄉志》、《溫氏族譜》等。朱汝珍，清遠人，原名倬冠，字玉堂，號聘三，別號隘園，生於一八七〇年，光緒丁酉，考取優廩生，光緒二十四年朝考一等第十一名，光緒二十九年癸卯恩科順天試舉人，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會試，以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三十二年奉派留日，列最優等，畢業於法政大學。回國後，任京師法律學堂教授，先後創制民法及商法。一九三一年，朱氏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史科講師，一九三二年香港孔教學院聘為院長，一九四三年卒。遺著有《清遠縣志》、《陽山縣志》及《詞林輯略》等。岑光樾，順德人，字敏仲，號鶴禪，生於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科考，古學歷史第一，院試冠軍，補邑庠生。光緒二十七年廣東鄉試，中式第四十一名舉人，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會試，中式第三十二名貢士，殿試二甲第二十四名，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一九〇九年，岑氏奉派遊學日本，同年任國史館纂修，實錄館協修。一九二五年到港，一九二六年受聘為官立漢中及漢師講席，創辦成達中學，遺著有《鶴禪集》²⁹。這群翰林曾在廣州廣雅書院、越秀書院求學，先後師事廣東名儒李文田及簡朝亮等³⁰。隨清翰林任教書樓及港大中文學院，使中國傳統經史之學傳於香江，時人有謂：「書樓有頗大的講室，飽學之士，輪番登臺講學，盛極一時。」³¹

此外，俞安鼎的講授內容為「尤諄諄以辨華夷，明體用詔諸生」，而何藻翔則「以宋儒義理及《通鑑》、《通考》掌故之學，啟蒙後進」，振興師道，師生間感情融洽。其時書樓的熱鬧情況為：

當年在書樓設壇講學，每周二次，每當太史公登壇，全場肅靜，鴉雀無聲，聽眾屏營，必恭必敬，太史長衫布履，雍容端座，聽眾起立致敬，然後坐

²⁹ 見鄧又同編《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一書簡介書樓主講各節；另可參〈保全國粹、宏揚文化：香港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頁13-25。

³⁰ 有關這群前清翰林與香港中文教育的發展，參梁基永：《李文田》（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79；區志堅：〈香港高等院校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發孕（1920-1927）〉，頁29-59；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258-322。

³¹ 潘世謙：〈我的良師〉，《蛻庵全集》（香港：新格致出版社，1986年），頁193。此文評論客觀，一方面敘述聖士提反中學部分學生沒有興趣修讀中文課，而賴太史執教其中，作者不諱言賴氏任教中文課的情況未如理想；另一方面因潘氏有興趣就讀國學，對賴氏上課的情況也感興趣，故此文論述有褒有貶，頗客觀地描述書樓主講的教學情況。

下，講課既畢，致敬如儀。斯時授課，以《四書》、《五經》為主，闡揚孔孟之道及《春秋》微言大義，冀揚國粹，挽救世道人心於失墜之餘。³²

書樓的講學活動，主要表彰中國傳統學問，藉教導經學等知識，扶持世道人心。書樓成立的使命，就是「避地居港，創設茲樓，謂宏振斯文，聚書講學」³³。

書樓不獨扮演了教學的角色，也開辦圖書館，方便市民自行借閱藏書，使國學知識也從另一途徑傳於民間。因書樓設閱覽室，供公眾借閱，而此時香港政府尚未設立公共圖書館，書樓成為香港有史以來第一所民間設立最早的公共圖書館。在般含道二十號的書樓，主要分為三層，以三樓藏書，二樓講學，其時教育司也認為「事關文化，親臨參觀，許年助買書費一千元，四年始停」，又得紳商陳棉生捐玻璃書櫥數十具，書籍久藏不壞³⁴；並得到富商戴紫汀捐資以刊書目，成兩巨秩，印出千本，致送海內外文化機構。書樓主講俞安鼎也描述書樓藏書的情況：

吾書樓建立之旨，所以保存古籍，發揚國粹，故除度藏書籍外，每週講學，向有定規，兢兢不墜，歷有年所。³⁵

至今尚未找到二、三十年代書樓藏書目錄，但依一九八八年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目錄》所見³⁶：書樓連複本三萬四千六百餘冊，共藏書一千九百種。二萬六

³² 鄧又同：〈香港學海書樓之沿革〉，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1946-1964）》（香港：成記印刷廠，1990年），頁2。

³³ 賴高年：〈序〉，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1965-1989）》（香港：成記印刷廠，1990年），頁3；徐信符：〈廣東藏書記事略〉，《廣東文物》（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頁7。

³⁴ 有關商人捐贈藏書給書樓的情況，見〈誌學海書樓之源起及今後之展望〉（民國三十七[1948]年二月，未刊稿，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藏本）。

³⁵ 俞叔文：〈原序〉，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1946-1964）》，頁61；有關二十年代，大批廣東的傳統文人南下，他們多不喜革命，但又不能復清室，便以遺民自居，整理國故，詩賦自娛，見羅香林：〈中國文學在香港之演進及其影響〉，《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頁197。另參黃坤堯：〈前言〉，黃坤堯編：《番禺劉氏三世詩鈔》（自刊稿），頁16-17；黃坤堯：〈陳步堉《繡詩樓叢書》與晚清文學在香港的延續和發展〉，中山大學中文系編：《第二屆國際清代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1999年），頁515-541。

³⁶ 雖然《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目錄》是成於1988年，但其收藏的書籍，據賴恬昌教授所示，主要是上承二、三十年代的書樓藏書，故此《目錄》甚可參考。況且，二十世紀末的書樓藏書內容尚且如此，不難得見民初書樓也是收藏傳統經籍為主。有關書樓的藏書情況，見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藏書目錄》（香港：學海書樓，1988年）一書；又參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香港：學海書樓董事會，1995年），頁151-167。有關書樓的藏本情況，見黎恩、梁基永：〈香港學海書樓藏書考〉、〈關於學海

千八百冊的典藏書種中，經部有二百七十四種，共三千三百六十三冊；史部三百二十種，共三千四百五十冊；子部有九十八種，共六百四十冊；集部有一千二百零八種，共一萬九千三百四十七冊。書樓藏書雖以集部及廣東版本的書籍為主，但更多是：1. 明末清初廣東人經學著作；2. 廣東志書；3. 經、史、子、集的著作為要。集部書籍以廣東版本為多，如菊坡精舍、學海堂、廣雅書局、粵雅堂叢書、嶺南遺書、廣雅叢書、粵十三家集、翠琅玕館叢書等。如南海康有為的《論語注》（1902 及 1917 年刊本）、《孔子改制考》（1922 年刊本），順德簡朝亮《論語集注補正述疏》、《孝經集注述疏》，宋人陳祥道《禮書、樂書》（廣州學海堂版本），同治十年廣州重刊《十三經注疏》，廣州學海堂的《皇清經解》，廣州學源堂版宋人陳祥道著《禮書、樂書》，資政堂版本明人湛若水著《春秋正傳》，光緒版本潘衍桐《爾雅正郭》等。史部收藏了陸奧宗光《日本侵略中國外交祕史》、吳自修《辛亥殉難記》。可見書樓籌辦之初已構想服務對象，以閱讀中國傳統經史讀者為主，結合學員參與有關講演的內容，書樓學者再生產的知識，也以獲取傳統經史知識及道德涵養的人生哲理為要。

一九二六年，香港華商多倡辦以中文為本的漢文中學，及後得港督金文泰允許，同年成立香港第一間官立漢文中學及漢文師範學院，由書樓主席賴際熙在港大的學生李景康任校長。其後香港政府也委任賴氏及區大典為課程督導，聘請翰林溫肅任國文教席，在漢文中學內也有教導《論語》及《孝經》³⁷。

三、保存國學，融貫新知 ——書樓主講與港大中文學院的成立

港大中文學院於一九二七年成立，我們得知中文學院第一任兼任主任就是賴際熙，任此學院的中國經史及哲學科目的教員；除賴氏外，尚有區大典及溫肅。此三人也是學海書樓的活躍學者，而中文學院科目的編排，就是由賴際熙籌劃。教員不獨在文學院作教授，又參加學海書樓的講座，可知書樓的教員與港大中文學院課程

書樓的藏書問題——前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總館長吳懷德答問》，《香海傳薪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 年），頁 281-287。

³⁷ 見金文泰中學博物館藏書，誠蒙前金文泰中學李瑞華校長所示。

的規劃甚有關係，當然總其事者，就是賴際熙³⁸。

其一，籌辦課程。前文已言，在一九二七年港大中文學院未成立之前，中文科教學內容尚未多專注於傳播及研究中國經史學的知識。從下文可見，在一九二七年後，才注意中國傳統經史專業知識的培訓。

然而，籌辦課程主要依靠賴際熙的經濟支持及課程規劃。經濟支援方面，二十年代中葉，港大中文學院籌辦之初，遇到不少困難。省港罷工後，香港經濟受到重大的影響，特別是英商的營業額受到打擊，庚子賠款的運用也遇上問題。終於在賴氏及校長韓理和爵士 (Sir William Hornell) 任大學校長 (Vice-Chancellor)，金文泰任總督後，情況才好轉，並在賴際熙的策劃下，編了〈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指出華文部成立的目的是「保存國學，融通新知，舉凡經學、史學、哲學、法學、文學、美學，參匯中西，由博反約」。希望紳商領略大學尊重中國禮教政俗之善意，竭力支持中文學院的成立。韓理和便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偕同賴氏，帶此計畫書，前往南洋各地，向檳榔嶼華僑戴芷汀的兒子、吉隆坡的陳永及廖榮等華商募款，終得四萬元。據賴氏哲嗣所指，這些款項主要是賴際熙向華僑籌來的。因為賴氏為晚清遺老，在海外有名聲，海外華僑甚為器重他的地位，中文學院成立與賴氏的努力甚有關係³⁹。在這四萬元的支持下，中文學院得以成立，而原想成立的 Chinese Faculty 的意願因經費所限，未能即時實現⁴⁰。在此要注意的是，港大中文學院和中文系成立是不同的，中文學院和中文系雖用同一批教員，但中文學院至一九三三年停辦，賴太史也請辭。此後，中文學院也進行課程改革。

若比較在一九二六年的《香港大學文科華文部規劃書》(Syllabus of Chinese

³⁸ 有關賴際熙及陳伯陶居港原因，非本文主要研究的重點，見區志堅：〈粵港學人交往——學海書樓教員之研究〉，陳明鈺主編：《近代粵港關係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86-101。

³⁹ 〈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賴際熙：《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1年），頁172-174；參〈賴恬昌教授訪問稿〉（未刊稿）。

⁴⁰ 見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Appointed to Advise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1932), p. 3；參 *Syllabus of Chinese Studies, Arts Facul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The Newspaper Enterprise, 1926), p. 3。要注意當時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尚未有統一的中譯名稱，除譯為中文學院外，還有漢文學院、漢文大學院、漢文大學、漢文科學部、中文部、華文部等。又，港大校方尚未積極支持中文學院的成立，1931年成立的大學校務委員會的委員中，沒有賴際熙及區大典，可能與他們不諳英文有關；甚至在1932年委員會提交的報告上，委員以為，中文學院尚未及預科程度的學生授課，有別於其他科系。

Studies, Arts Facul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與賴氏等人早於一九二六年設計的〈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可見中文系的課程是出自賴氏。

一九二六年的《香港大學文科華文部規劃書》，文字為中英對照，收入「香港大學華文部課程學則草案」(Draft of Syllabu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oposed Chinese School in Hong Kong University)，把學院的課程分為經學、史學、哲學、文詞、翻譯五部分，再細分經學甲、經學乙、史學甲、史學乙、哲學甲、哲學乙、文詞共七門，內容主要是：

一、經學

甲、普通類：四書、孝經、書經、詩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

乙、專選類：易經、書經及詩經、春秋三傳及國語、三禮（以上四項任擇其一）

二、史學

甲、普通類：繹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近代史

乙、制度類：輿地、戶口、財政、選舉、職官、禮樂、刑律、兵制（任擇其四）

三、哲學

甲、子學：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管子、韓非子、申子、楊子（任擇其四）

乙、理學：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

四、文詞

文字源流

文學史

詞章

公牘

五、翻譯

學生習三門者才算畢業，分兩組：

1. 全習華文部者

經學甲、史學甲、華英翻譯為必修，另任擇三門，共須習六門。

2. 習英文部一門，華文部三門者

經學甲、乙，史學甲、乙各擇一門；哲學甲、乙，文詞，任擇其一。

結合賴氏在〈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要求華文部成立的目的，是「保存國學，融通新知，舉凡經學、史學、哲學、法學、文學、美學，參匯中西，由博反約，即如大學原定有比較中國與羅馬法律學之計劃」，又說：

華文專科，果恣成立，承學之士，得以修文讀史，專詣旁證，閉關之局既完，宏達之材是賴，大學因時乘勢，造就通儒，行見青年士女，學成致用，中西文化，參互溝通，萬國邦交，實利賴焉，此則吾人之宏願也。⁴¹

可見賴氏等人認為中文學院成立，不獨傳播中國語文的知識，更有保存中國文化、融會新知，達到中外文化交流的目的。雖然於一九二六年，這課程綱要上呈教務委員會 (Senate)，被認為不合學位課程的學術標準，要求學生的英文程度也不足；但可見籌辦中文系的課程綱要乃出自賴氏。同時，金文泰於一九二六年初，也與教育司 Wood A. E. 提出設立中文系。賴際熙及區大典被聘為全職教授 (Reader)，林棟為翻譯員 (Translator)，賴氏兼任系主任，校方更任 Revd. H. R. Wells 為中文科顧問，可能藉此方便與以英語為校方法定語言的行政人員溝通，此時更開始籌辦中文系。其後，在《一九二七年大學年曆》(Calendar, 1927) 所載中文科的課程綱要，備有中英文對照，而中文版本的首頁有 Syllabus for Chinese Department 開辦課程的項目，可見中文系已成立，並屬於大學體制內的一部分。其開辦課程主要是：

第一年：

經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以朱子《集註》義理為主，參以古註訓詁）；

史學：（甲）注意在歷代治亂興衰：《通鑑輯覽》（自三皇起至秦止）、《史記》（自〈五帝本紀〉起至〈秦始皇本紀〉止）；

（乙）注意在歷代制度沿革：唐虞至兩漢疆域考（以《九通》為主，參以《廿四史》〈表〉、〈志〉，有講義）；

文詞學：精選歷代名作。

第二年：

經學：《詩經》、《書經》（以《十三經註疏》為主，參以《欽定七經》）；

史學：（甲）注意在歷代治亂興衰：《資治通鑑》（自西漢起至東晉止）、《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擇編講義）；

⁴¹ 〈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頁 169-173。

(乙) 注意在歷代制度沿革：唐虞至隋疆域考、戶口考（以《九通》為主，參以《廿四史》〈表〉、〈志〉，有講義）；

文詞學：歷代名作。

第三年：

經學：《儀禮》、《周禮》、《禮記》（以《十三經註疏》為主，參以《欽定七經》及《五禮通考》）；

史學：（甲）注意在歷代治亂興衰：《資治通鑑》（自南北朝起至五代止）、《通鑑記事本末》、《南北史》、《隋書》、《唐書》、《五代史》（擇編講義）；

（乙）注意在歷代制度沿革：唐虞至宋疆域考、戶口考、財政考（以《九通》為主，參以《廿四史》〈表〉、〈志〉，有講義）；

文詞學：歷代駢散文名著。

第四年：

經學：《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以《十三經註疏》為主，參以《欽定七經》）；

史學：（甲）注意在歷代治亂興衰：《續資治通鑑》（自宋起至明止）、《宋史》、《遼金元史》、《明史》（擇編講義）；

（乙）注意在歷代制度沿革：歷代疆域、戶口、財政及其他制度（以《九通》為主，參以《廿四史》〈表〉、〈志〉，有講義）；

文詞學：歷代詩文名著。⁴²

此外，中文系也開辦「正音班」，方便不嫻熟國語（普通話）的學生修讀；另有開辦「翻譯學」，主旨在教導學生溝通中外學說，造就翻譯人才。自此至一九三三年中文學院停辦、賴際熙離開港大之前，中文系的課程沒有太大改革。若以此課程與賴氏在一九二六年提出的華文部課程的建議所見雖有分別，然而也可見一九二七年的中文系課程與賴氏等人提出的課程綱要甚有關係。

其二，編寫教材。在現存的資料所見，這群執教港大中文學院的前清翰林及書樓主講，也為早期港大中文學院編寫經學教材。

⁴² 依所載 1927 年課程綱要，見單周堯主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歷史圖錄》，頁 8-11。十分感謝評審者提供資料，特此致意！

首先是編寫教材，推動經學知識流布。書樓主講在港大執教期間，先後編了多本教材，如區大典編《春秋三傳講義》、《論語講義》、《孝經通義》、《周官經講義》、《儀禮禮記合編講義》、《書經講義》、《孟子通義》、《易經講義》、《詩經講義》、《大學講義》、《中庸講義》、《論語通義》等等，溫肅也編《哲學講義》，均曾用作大學堂的教材。在經學的研究上，主講多從漢儒鄭玄注經的方法入手，偏重漢儒的古文經治學方法。雖尚未清楚看見其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統的治學理念⁴³，但在另一本遺史《史學課本·弁言》（區大典編）一文中，指出欲考求歷朝政教的根本原理，必要翻閱舊文籍，「考求既博，則一切實業，其散見于諸書者，由萬殊而歸于一本，由萬派而匯于一源」，治學要「以經為經，以史為緯」，匯集眾說，從經籍中領略古人治世的常道；也從史籍所記載歷朝的史事中，觀歷代興衰，知時變得失，掌握變道，結合常變的道理，知治世要義。而「經」以載道，史以載事，經史內容既備政治、道學、藝術等歷代時變的事例，達到「正變無不盡歸其包涵矣」的效果。換言之，藉觀經籍，就可以幫助治世，「達到所用所學，乃能不相背馳，蘊之則為根柢之學，推之則為明達之材」，綱維天下政制的大道⁴⁴。

其三，組織人才。中文學院成立之初，教員除賴際熙、區大典外，尚有一九三〇年聘溫肅為兼職中國哲學和文學講師，一九三二年聘朱汝珍為兼職中國哲學和文學講師，一九三一年再聘羅懋棠為兼職中文講師。這些教員除了羅氏以外，其他均為書樓的成員，書樓成為二十年代中葉，團聚前清翰林及在港傳播傳統學問的平臺，而書樓也是賴氏籌辦的。換言之，賴氏的人際網絡成為結合港大中文學院教員的重要力量。試看溫氏初臨香江，因為水土不服而生病，得賴氏介紹華商陳子丹與溫氏交往，並代溫氏支付藥費，而溫氏也因賴氏邀請，執教中文學院哲學課程⁴⁵。故賴際熙應是晚清南來移居香港的遺老中，交遊士林及與商界的人脈甚廣的人物，而他也可能是華商與遺老交往的中心人物之一，因他的努力，聯結了其他遺老執教港

⁴³ 依許振興考訂，《春秋三傳講義》、《論語講義》雖列為「遺史氏輯」或「遺史輯」，但應為區大典輯。見區大典輯：〈1912-1941 年間香港的經學教育〉，施仲謀：《百川匯海——文史譯新探》（香港：中華書局，2013 年），頁 162-164。

⁴⁴ 遺史氏編：〈弁言〉，《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史學課本》（缺出版資料，書脊有「奇雅中西印務」字樣），第 1 冊，頁 2。誠蒙賴恬昌教授借閱原稿及影印本。

⁴⁵ 溫肅：〈與區徽五書〉，《溫文節公集》（香港：學海書樓，2001 年），頁 190。

大中文學院⁴⁶。

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後，港大中文系的課程做了大規模的改革，但不可忽視早期賴氏及其遺老們，或參與籌辦港大中文課程，或任教其中，當中尤以賴氏籌辦中文系的辦學理念及其人際網絡至為重要。賴氏積極向海內外華商募捐中文系的經費，也間接促成中文系的成立。他們各人的努力，以及開拓本地高等院校中國文化教育及經學教育的筆路藍縷之功，實不能忽視。

四、三十年代至今學海書樓普及經學知識的發展

一九三五年，港大雖有許地山倡導中文學院課程改革，中文學院分為普通文學部、文學部、歷史學部、哲學部，乃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更有其時學生陳君葆認為「學生討厭了經學」，甚至如許振興所言「這將傳統經學完全摒諸門外的課程設計，一直被沿用不替。香港大學文學院自一九一三年始設傳統漢文 (Classical Chinese) 課程，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大學因日本軍隊侵占而停課，前後三十年間，傳統經學在大學課程裏的生存空間終被完全剝奪」⁴⁷。車行健也說，三十年代「港大中文學院就不再有經學的課程了」⁴⁸。但學海書樓以民間機構承擔傳播經學知識為己任的工作，卻未有停止。書樓主講如賴際熙等，雖或離世，或不任港大教席，然而書樓自三十年代以後，更朝向民間，普及經學知識的發展。

區大典等諸位太史的學生李景康於一九二四年為香港教育司聘，任本港教育司署漢文視學官兼英文視學官。旋於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李氏任漢文中學（日後的金文泰中學）及官立漢文師範學校的校長，又聘區大典、區大原諸位太史為教師，且與區大典等合編《國文模範讀本》三冊，並成《儒家學說提要》⁴⁹。此書採四書言德道性情、仁義禮智、孝悌忠信諸條，分類羅列。依今天金文

⁴⁶ 記載有關賴際熙的人際網絡，見岑光樾：〈輓〉，《賴太史公哀思錄》（香港：出版社不詳，2009年）。誠蒙賴恬昌教授代為影印此書，特此致意。

⁴⁷ 見許振興〈民國時期香港的經學：兩種大學哲學課本的啟示〉一文。

⁴⁸ 見車行健：〈胡適、許地山與香港大學經學教育的變革〉，《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3卷第5期（2009年9月），頁26-30。

⁴⁹ 〈李校長〔按：李景康校長〕傳略〉，《金文泰中學新校舍落成紀念特刊》（香港：金文泰中學，1962年），頁125。

泰中學校長所言，以上書籍曾為金文泰中學修讀中文科的教本⁵⁰。《儒家學說提要》力言此書的內容為「就儒家之綱領要義，用分析綜合之法，加以研求，結果得其基本學說二十餘萬字，以每字為綱，以內容分析為目，根據四書，參以五經，概守『引經證樸實說理』之原則，使每說綱舉目張，一線穿成，以求其本旨之所在。蓋學術為天下之公器，最重平實，始能傳之久遠，不容後世之曲解與臆說」。以四書內容，分「學」、「性」、「心」、「德」等類目，把儒家教導要義存於書中⁵¹。

雖經戰亂，書樓同人聲散，書籍器物無存，但「書樓不絕如縷，雖寇氛告靖，同人先後返港，逐漸規復舊觀，書籍且比前增益」⁵²，一九四六年書樓復課。其實早於此年之前，乃於二十年代末，書樓翰林已為公眾人士，舉辦有關經史知識的講座，從事「下層社會啟蒙運動」⁵³，如⁵⁴：

講座題目	主講人
講述經義	陳伯陶
講經學、談易經、揚儒學	區大典
講學多闡發人倫大道、忠孝詳義	溫 肅
課經史、宣揚孔學	朱汝珍
主講經史、宏揚儒學	岑光樾
課經史、授詞章	區大原

可知書樓主講早已注意以公開講學，向群眾傳播經史知識，「每周兩次，輪值講學，所授均為四書五經，旁及子史詩詞」，這些講座於日據時期一度中斷⁵⁵。

一九四六年，香港重光，早前書樓主講多離世，只有俞叔文及岑權波任主講，

⁵⁰ 見〈前金文泰中學李瑞華校長訪問稿〉（未刊稿），頁 54。

⁵¹ 李景康：《儒家學說提要》，收入《李景康先生詩文集》（香港：學海書樓，2003 年），頁 171-347。

⁵² 李景康：〈序〉，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頁 1。此選集也收錄 1953 年至 1964 年書樓講學錄。

⁵³ 晚清以來，很多知識分子已注意藉演說啟蒙民眾，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年），頁 84-103。可見三十年代籌辦書樓的人士，已具有現代性的視域，向公眾人士推廣經學知識。

⁵⁴ 〈附錄：香港學海書樓講學名錄〉，《香海傳薪錄》，頁 83。

⁵⁵ 伍步剛：〈序一〉、賴恬昌：〈序二〉，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頁 21、32。

及後邀請陳荊鴻、鄭水心、伍憲子、梁寒操等輪流講學。自一九五三至一九六四年，講學以經學知識為主要內容者，如：

講者	講座（有關經學知識）
伍憲子	孔子
梁寒操	孟子的人性論
朱子範	毛詩十五國風述義
李景康	說義
黃維琚	原孝
陳湛銓	周易坎離二卦
黃維琚	孝道淺說 ⁵⁶

教導經學知識方面，尤邀請了陳湛銓主講一系列有關《易經》的義理，於二〇一四年更由湛銓先生的門人，把先生在書樓的演講稿及研究《易經》文稿整理成專書，予以出版，先生研究經學精義得以廣披香江⁵⁷。

同時，書樓更於五十年代末，運用現代傳播媒體，廣傳經學知識。一九五八年，書樓與香港電臺合辦「中國文學講座」，在電臺演說內容涉及經學者，如上文所列陳湛銓「《周易》坎離二卦」，取四書內容演說者有梁寒操「孟子的人性論」、黃維琚「孝道淺說」。更有學者認為，五十年代書樓舉辦學術演講甚有成效，為「講座地點有所改善，聽眾有所增加」、「與電臺合作而擴大了影響」⁵⁸。

一九六八年，書樓與商業電臺合辦「國學講座」，其後改為「播音國學講座」，定為每周三次。一九六九年，書樓與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合辦周六「國學公開講座」；於八十年代，書樓又與香港中文大學合辦國學文史教學文憑課程，旋與香港城市大學合辦國學專修文憑課程，又與多所大專院校合辦國學專修文憑課程。此外，書樓舉辦的公開國學講座，每星期三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五十分在灣仔駱克道市政局公共圖書館，每星期五下午六時至七時三十分在九龍油麻地市政局

⁵⁶ 見《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1965-1989)》一書。按：書樓主講也多講有關史學、文學作品的內容，本文只是介紹書樓主講經學的內容。

⁵⁷ 〈編後語〉，陳湛銓著，陳達生、陳海生編：《周易講疏》（香港：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48-52。有關陳湛銓的生平及經學研究特色，參黃偉豪：〈香港南來學者的經學思想〉，林慶彰、蔣秋華主編：《變動時代的經學與經學家》，第5冊，頁465-494。

⁵⁸ 駱偉：〈學海書樓國學講座述略〉，《香海傳薪錄》，頁83。

公共圖書館，每星期六下午二時十五分至三時四十五在九龍馬頭圍道市政局公共圖書館，每星期日在香港中環大會堂八樓演講廳舉行國學講座。講座內容除了文學及史學知識外，也有經學知識，而學海書樓也以九龍尖沙咀星光行一四〇五室為永久地方，並曾在書樓開辦國學班⁵⁹，邀請講師向學生教導經學知識，修讀者有不少中學教員⁶⁰。

據一九八六年至二〇〇四年學海書樓開辦課程的統計，於一九八六年四月至一九八七年三月舉辦了一八二次演講，聽眾共有一萬五百多人；於二〇〇二年四月至二〇〇三年三月，舉辦了一九二次演講，聽眾共有一萬九百多人；自八十年代至今，也是一周舉行四次講座，當中也涉及經學義理，如溫中行自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日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演講「《論語》選講」，並由香港電臺轉播。其他學者如：陳本演講「讀講《孟子》」、何叔惠演講「孟子人格教育」、李巽仿演講「《孝經》」⁶¹。自二〇〇四至二〇一三年，學海書樓舉辦的國學講座主要談及四書和經學知識者，如下⁶²：

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講座次數	聽講人數	平均每次人數
2004年1月至6月及9月至12月	陳汝柏	易經	駱克道圖書館	40次	2181人	54人
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	黃兆顯	四部選粹	土瓜灣圖書館	45次	2074人	46人
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	洪肇平	左傳	大會堂圖書館	12次	996人	83人
2007年9月至10月	朱冠華	同上	九龍圖書館	12次	661人	55人
2008年2月	許子濱	儀禮	柴灣圖書館	2次	57人	28人

⁵⁹ 《發揚文化·學海書樓·保全國粹》（小冊子），頁碼不詳。

⁶⁰ 其時一位學員為中學教員勞美玲老師，〈勞美玲老師訪談〉（2015年4月3日）（未刊稿）。

⁶¹ 〈市政局圖書館與學海書樓：中大校外部及香港電臺合辦國學講座〉（原刊1979年2月5日、12月11日《華僑日報》），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頁44、49、61、64、69、89、91、95、105。

⁶² 詳見《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一書內，有關書樓活動的剪報；參鄧巧兒輯錄：〈學海書樓國學講座概況〉，《學海書樓九十年》，頁95-108；參〈發揚文化，保全國粹：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頁13-25。

日期	講者	講題	地點	講座次數	聽講人數	平均每次人數
2008 年 3 月	朱冠華	論語	同上	5 次	225 人	45 人
2008 年 4 月至 7 月 及 9 月至 12 月	陳汝柏	易經	駱克道圖書館	33 次	2000 人	61 人
2008 年 4 月至 6 月	朱冠華	論語	大會堂圖書館	13 次	869 人	67 人
2009 年 4 月至 6 月	同上	易經	同上	11 次	1221 人	111 人
2009 年 4 月 及 2010 年 1 月至 3 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15 次	1336 人	91 人
2010 年 4 月 及 2011 年 1 月至 3 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15 次	1163 人	78 人
2011 年 4 月	同上	同上	同上	4 次	311 人	78 人
2011 年 6 月	許子濱	儀禮	駱克道圖書館	4 次	212 人	53 人
2012 年 4 月至 6 月	朱冠華	易經	大會堂圖書館	13 次	1174 人	90 人
2012 年 6 月至 7 月	區永超	論語分類選講	駱克道圖書館	9 次	690 人	77 人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	洪肇平	禮記、孝經選讀	大會堂圖書館	18 次	1702 人	95 人
2013 年 1 月至 3 月	朱冠華	易經	同上	11 次	1403 人	78 人

由此可知，五十年代以還的學海書樓，已多注意與電臺及其他學術機構，如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學部合辦講座，從多元化的學術聯繫網絡，積極把經學的知識傳於民間⁶³。

談及現代學術發展，可以注意學人多喜把講義成書⁶⁴；書樓主講也喜把上課講義先在講堂上予以影印頒發。聽眾得以即時閱讀講義，配合聆聽講者生動演說，加

⁶³ 承李金強教授於 2015 年 5 月 6 日研討會後，談及他於中學就學時，多收聽電臺廣播陳湛銓演講《易經》、小磐演講古典文學作品，為獲得國學知識來源之一。又承李教授告知學海書樓的主講曾在建道神學院講授經學。

⁶⁴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43-150。

強知識傳播的感染力，同時也能感受講者的學術氣魄，藉與講者演講後的討論，加強與經學知識的互動。講堂成為主講及聽眾交往知識的平臺。日後，書樓也喜把講義整理成專刊予以出版，既保存文獻，又可以廣傳知識。書樓主講余叔文早已說出「當其一堂授受，訢合無間，而又擇焉而必精，語焉而必詳，是以筆之於書，以免遺忘，而備他時之誦習，且足以傳播遠方，為學子所觀摩，法至良，意至美也」。書樓講學以來，積稿日夥，故編「演講錄」，「以通儒碩學，丕振宗風」，以傳聲教，「保存文獻，宏揚國粹」，望「港人沾濡流澤」⁶⁵。書樓也先後編刊四集《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 (1946-1964)》及《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其後，把陳湛銓的講義編成專書《香港學海書樓陳湛銓先生講學集》，又把主講張文燦上課演說的〈詩經講義〉以《詩經探微》為名，由書樓出版⁶⁶。

《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 (1946-1964)》及《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收了不少演說經學的文章，作者也以淺白文字，闡述經學知識，如：

作者	文章	收錄	原刊出版年分	文稿收入
伍憲子	孔子	第一集	1953	《香港學海書樓前期講學錄彙輯 (1946-1964)》
梁寒操	孟子的人性論	同上	同上	同上
朱子範	毛詩十五國風六義	第二集	1955	同上
李景康	說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說義	第三集	1959	同上
黃維琚	原孝	同上	同上	同上
陳湛銓	周易坎離二卦	第四集	1964	同上
黃維琚	孝道淺說	同上	同上	同上
何叔惠	論語雍也篇第廿七章註釋		1990	《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
同上	同上			按：此為二次演講的不同內容
同上	同上			同上

⁶⁵ 余叔文：〈序〉、利榮森：〈序〉，《香港學海書樓講學錄選集 (1965-1989)》。

⁶⁶ 有關陳湛銓研究易學的特色及傳播經學知識的貢獻，見謝向榮：〈陳湛銓先生易學研究述略〉，2015年5月6-7日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新亞研究所主辦「香港經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作者	文章	收錄	原刊出版年分	文稿收入
陳 本	孟子文法研究			同上
盧國洪	論語言治國五事			同上
同上	孟子事略附孟子賦			同上
陳汝栢	周易繫辭傳之作者			同上

書樓的特色之一是「聚書講學」、「藏書其中，恣眾觀覽」⁶⁷。然而書樓經戰亂，年久失修，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重行開放，並「所望港中各界熱心文化者，繼續送出藏書」，依一九四八年初步統計，藏書共三萬餘卷⁶⁸。其後，書樓董事再行商議，並於一九六二年與政府機構的市政局討論及協作，把藏書長期借存於香港市政局大會堂公共圖書館，給予讀者借閱。在〈學海書樓藏書長期借存香港市政局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合約〉中明言：「（一）學海書樓藏書借存大會堂圖書館，由經理全權管理。（二）學海書樓藏書存在大會堂圖書館，可供社會人士自由借閱，但不得帶離圖書館。（三）圖書館主管有權全權將學海書樓藏書釘裝、修補，並將不便儲藏部分退還學海書樓。（四）學海書樓得隨時要求退還任何部分書籍，惟必須先付回合理之書籍修補費用。（五）主管盡量設法將書樓書籍保存，但政府及其屬下人員對書籍之遺失或損壞不承擔任何責任。（六）圖書館主管有權酌量在學海書樓書籍面上加蓋學海書樓藏書標誌或所需符號。（七）經理須標誌：『學海書樓藏書長期借存於圖書館以利公眾閱覽』之匾額，懸掛在圖書館之內。（八）學海書樓可於每周星期日下午二時至四時，或其他日期時間，免費借用大會堂高座演講室作為公開國學講座之用。實際時間，得由大會堂全權決定。（九）學海書樓倘有需要，可要求大會堂圖書館將本書樓藏書退還，惟必須先付合理之補償與市政局，如修補、重裝書籍等費用。」⁶⁹二〇〇一年，隨著位於銅鑼灣的中央圖書館落成，書樓遂把藏書遷存於中央圖書館學海書樓藏書室，供市民隨時借閱⁷⁰。書樓也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至十二日，在大會堂公共圖書館舉行「學海書樓特藏——廣東文獻書展」，配合展覽並舉行專題演講，展出屬於經學的藏品，如康有為《論語注》及《孔子改制

⁶⁷ 參〈誌學海書樓之源起及今後之展望〉。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學海書樓藏書長期借存香港市政局大會堂公共圖書館合約〉，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頁 120。

⁷⁰ 〈學海書樓大事記〉（第 2001 條），《學海書樓九十年》，頁 228。

考》等，均是珍貴刊本⁷¹。此外，依鄧又同編〈廣東文獻書籍目錄〉中指出，書樓收藏屬於經學部分的書籍，有：

作者	書名	版本
	十三經注疏	清同治十年廣州版本重刊
	皇清經解	廣州學海堂版本
簡朝亮	孝經集注述疏	
康有為	論語注	
簡朝亮	論語集注補正述疏	
康有為	孔子改制考	
黃倬南	孔道	香港嘉屬商會印製
	古經解彙函	清同治十二年廣東版本
康有為	偽經考	
陳 澧	東塾讀書記	
陸德明	經典釋文	粵秀山文瀾閣藏版
張其淦	同上	
陳祥道	禮書、樂書	廣州學源堂版本
簡朝亮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湛若水	春秋正傳	資政堂版本
張百行	小學集解	光緒辛丑年廣雅書院本
潘衍桐	爾雅正郭	同上
鄭 露	赤雅	恬淡山堂藏本
	音樂辨微	手抄本
陳 澧	聲律通考	
譚荔垣	孔學臆測	香港孔教學院刊本
何文綺	制義約鈔	1848 年粵秀書院版
陳湛銓	周易乾坤文言講疏	

⁷¹ 〈大會堂圖書館舉辦廣東文獻展出二百餘珍本〉，鄧又同編：《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頁 133。

作者	書名	版本
陳伯陶	孝經說	
何竹平	孝經淺說 ⁷²	

以上藏書不少是珍貴的刊本。

五、結 論

「官禮得存諸域外，鄒魯即在于海濱」出自「僑居香港」的前清翰林賴際熙先生撰寫的〈籌建崇聖書堂序〉一文。他欲把禮儀節文存諸於中國疆域之外，並以鄒魯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存諸於民國建元後、位處海濱的香港⁷³。學海書樓自一九二三年創建至今，歷經戰亂至復課，積極為香港推動國學教育，尤促使經學知識於二、三十年代在高等院校發展。至一九四五年香港重光後，更把涉及經學範圍的知識，傳往民間。書樓先哲講學及藉讀者閱讀書樓藏書，以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秉持「發揚文化，保全國粹」、「聚書講學，兼而有之」的辦學宗旨，書樓成為香港第一個私人籌辦供公眾運用的中文圖書館。前清翰林主講書樓及任香港大學教席，並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籌劃中國傳統知識的課程，由是推動經學知識在香港大學及香江的流播。當然，其後因為港大中文系課程改革，促使書樓主講任教中學，及加促主講們多從事民間傳播經學知識的教學工作，為香港定下了文化基礎。時至今天，書樓仍舉辦國學講座活動，並把藏書長期借存中央圖書館，供市民借閱。賴際熙雖於一九三三年離開港大，其後中文學院也進行課程改革⁷⁴，但是也不能否定賴氏及一群居港的前清翰林，使經學知識在香港分別朝向學院化、系統化和普及化發展的努力。近年更與公共圖書館合作，陸續把書樓藏善本、珍本，通過電子科技影像數位化，給

⁷² 鄧又同編：〈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香港學海書樓歷史文獻·學海書樓歷年講學提要彙輯·學海書樓藏廣東文獻書籍目錄》，頁152-166。

⁷³ 賴際熙：〈籌建崇聖書堂序〉，頁31；賴氏自認「僑居香港」，見氏著：〈賴際熙致仰喬書〉，鄒穎文編：《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08年），頁98。

⁷⁴ 曾有記載，港大中文系新舊學派之間衝突導致中文學院被廢，看來賴際熙在不滿意的情況下離去，見陳君葆：〈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條〉，《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上冊，頁74。

讀者自行前往公共圖書館網絡瀏覽，增加香港市民對國學的認識，當中也有很多珍貴刊本的經籍，可供讀者使用⁷⁵。而且，書樓自一九二三年成立至今，以一所私人籌辦的學術團體，能夠每周在香港不同社區內多間公共圖書館開辦講座、派發講義，聽眾甚多，每次主講涉及經學知識的課題，甚受讀者歡迎。這樣促使經學知識流布民間，學海書樓實居功至偉。

⁷⁵ 承蒙學海書樓行政秘書梁啟業先生相告，特此致意。

